前　言

在旧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突出。人们或许会问:抵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抗战,怎么会和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运动搅在一起?既然是民族矛盾突出,只要全民抗战就行了,还讲什么民主呢?民主和抗战不会互相矛盾、影响吗?讲民主会不会削弱抗战的力量?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是中华民族英勇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之一。它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以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促使国民党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最终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推动抗日战争顺利进行为根本宗旨、核心内容。它对促进全民抗战的进行,保证抗日战争这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土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日本占领区即沦陷区；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还有一种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又统称为大后方。通常所说的大后方又指未被日本占领的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西北等地区。通常所说的大后方民主运动，就是指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应该看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既带有地域的特点,又有普遍意义。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抗日敌后根据地民主运动在内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错综复杂，异彩纷呈，跌宕起伏。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重要篇章。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其特有的位置，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精神风貌。

这一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不仅有各爱国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参加，还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影响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因此，大后方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有区别。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运动的产生条件、发展进程、历史作用、特征特点、经验教训,探讨它和抗战胜利、以至于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密切关系，对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十分必要，对了解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贡献十分必要，对总结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十分必要，对进一步认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过程，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贯地为中国的民主、进步而斗争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决不是无源之水。追溯起来,可以说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主与科学两大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的对民主、科学的介绍、宣传热潮,使辛亥革命后逐渐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国观念更为广泛地得以流传。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民主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影响根深蒂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逆转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就产生和发展在这样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它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光荣传统，在抗

日战争如火如荼的特殊条件下的发扬光大。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是局部抗战时期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是民族矛盾尖锐导致阶级矛盾加剧的产物。中国国民党自 1927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开始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人民群众的正当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束缚。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制造九·一八事变,短期内占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政府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听凭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他们行动起来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逐步形成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 年至 1937 年间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促进全民族的觉醒，推动和促使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对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大敌当前、人民民主要求十分迫切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也有了若干进步。它坚持民族大义，抵抗敌人的侵略，全国人民自然有目共睹。但它没有也不愿意从根本上放弃反共反民主的专制统治，这就直接影响和阻碍着全民族抗战的顺利进行。为了实现抗战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大后方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国民党当局改良政治、实行民主，给全国人民以抗日的权利和其他各种民主权利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全国的民主运动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好形势下更加活跃，初具规模。因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更好地动员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民主是动员民众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人民没有抗日的民主权利，哪里会有抗战的胜利？而要求民主权利，就必然要触及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所以，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的大后方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这是抗战时期

大后方民主运动产生、发展的主要缘由。

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在宣传抗战、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大后方民主运动也从来也没有离开抗战的大局，更不是有意和国民党闹别扭、过不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表现为政治形态的民主运动自然有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当局不积极动员、组织人民，甚至对人民的抗日言论和爱国活动多方压制，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的出现就是如此。抗战结束后仅仅4年时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究其政治因素，完全是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的咎由自取。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势力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对人民的民主要求置若罔闻，以至最后与民心背道而驰的必然结果。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在抗战初期被迫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但实际上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这也是它后来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隔阂日深，最终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那种所谓民主运动妨碍了抗战的进行，是专门‘捣乱’的说法，纯属是不了解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的无稽之谈。

实际上，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处于特殊的环境，面临着复杂的关系。为争取抗战胜利，它必须维护国内的团结、统一，不能影响抗战大局；同样，为争取抗战胜利，它必须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地斗争。这是因为，不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坚持抗战步履维艰，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而斗争也要考虑到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考虑到它所处的执政地位。正是在这样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大后方的各爱国党派、民主人士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克服困难，逐步联合、发展，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热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民主运动的态度是矛盾的、复杂的，参加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也是有很大变化的。国民党虽然从未放弃一党专政的统治模式，但有的时候也打着民主旗号，标榜自己一贯主张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始终高举着抗日、民主两面大旗，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呼唤着民主的胜利，实际上是争取抗战后人民的胜利，中国有新的前途。前进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经历了一个在曲折中发展、深入的过程，大体呈“U”字形的发展态势。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前奏阶段。通常的说法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移到重庆以后才有大后方的概念，所以武汉时期被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预备期。这期间，国民党对日作战和对内政治改革的态度比较积极，宣布了国共合作，召集国民参政会，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国共合作处于黄金时期。爱国党派和民主人士抗日、民主的积极性都很高。这就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虽然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并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新址办公，但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全国的政治和民主运动中心是在武汉。所以，对于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来讲，这一阶段是序幕阶段、前奏阶段。

平稳发展阶段。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9月国民党宣布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大后方民主运动已在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展开，并且处于平稳发展阶段。随着国民党政府特别是最高军事统帅部移驻重庆，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逐渐成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自然成为民主运动开展的中心和活跃地区。1939年9月，大后方兴起第一次宪政运动，又称民主宪政运动。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同时，大后方的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初步联合组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出现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是这一阶段民主运动的主要标志。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逐步倒退，到 1940 年 9 月，历时一年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就此夭折，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转入低潮。

沉寂阶段。从 1940 年 10 月到 1943 年 8 月,大后方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处于沉寂状态。在此阶段，抗日战争处于艰苦卓绝的时期。国民党对日抗战出现动摇，对内进一步强化独裁统治。1941 年 1 月，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大后方的民主力量也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打击。民主党派一方面呼吁国内团结，一方面在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后方民主运动从此多了一支生力军。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策划的以皖南事变为高潮的反共磨擦，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国共力量对比变化都有利于中共。大后方民主党派的联合、力量的增强，为民主运动由低谷走向复苏和高涨，作了重要的准备。

复苏阶段。以 1943 年 9 月开始的第二次宪政运动为标志,大后方民主运动逐渐复苏。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节节胜利、中国敌后战场处于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形势，大后方人民和民主党派深受鼓舞。国民党估计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因此重新提出宪政口号笼络人心。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借此机会，再次在大后方掀起民主宪政的热潮。

高潮价段。 1944 年 9 月,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为标志，大后方民主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和政治影响的扩大，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公开领导者。

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拥护联合政府主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自身力量。大后方民主运动进入崭新阶段。在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更为强烈，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继续为民主呐喊、奔走，中国的民主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不可能不受到国内外战争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不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和其它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纵观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它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宗旨、目标明确。抗日战争时期民主运动和一般意义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相区别，和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以及中国其它时期民主运动相比也有其不同之处。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企图鲸吞中国的危急形势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并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出现的政治运动。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维护民族的独立、争取民族的解放，是全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心 任务,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义不容辞的责任。围绕着争取抗战的胜利及胜利后中国的前途而争民主,这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最主要的、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它的根本宗旨是坚持抗战、争取民族解放,以抗日为主旋律。正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民主运动才得以蓬勃兴起。同时,它又是一场反对封建顽固势力、争取人民解放运动。民主既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手段,又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包括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并为完成这双重的使命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第二,途径公开、形式基本合法。大后方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进行，它必然受国民党当局的制约和影响，不能超出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大后方民主运动主要采取了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虽然也有个别采用非法形式甚至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的,如大后方少数民族的起义,但毕竟是少数。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和国民参政会的讲坛，对大后方民主运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力量分布比较广泛。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力量来自各阶级、阶层,既有广大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也有工人和农民，但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大多是有一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文化界、工商界名流,如教授、作家、实业家、记者等等，知识分子占了相当多数。

第四,各种思想、观点交锋、交汇甚至融合。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力量在政治态度上比较复杂。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和党派鼓吹、留恋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力图以英美的民主政治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蓝本；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则要推进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运动。这两股不同的民主思潮在大后方运动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随着运动的深入，两种不同的民主思潮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后方民主党派、民主运动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根本点上团结一致。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种思想的交汇和融合。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在运动中逐渐扩大影响，逐渐占到举足轻重和有指导作用的位置。

第五,争取国际上民主国家和民主人士的同情和帮助。国内的民主与国际的民主是不可分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与完成，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特别是对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

府来说,来自民主盟国的压力还是起作用的,因为它希望得到盟国各方面的援助，它不得不考虑盟国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态度。

第六,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主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运动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有各种政治力量的以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实现民主的基本阵地，同时又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也算是民主的党派之列。中共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政治主张也是一种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即体现其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新民主主义。它在反帝反封建等若干点上与旧式的民主主义有相同之处，但它更能体现和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因此,中共的主张在大后方能逐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给大后方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并对其他民主党派产生影响。共产党充分肯定其它民主党派在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注意并帮助其克服局限性。因此,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参加、支持和指导。

第七,影响深远。随着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在一定意义上为抗战胜利，以及尔后中国政治协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宪政、特别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大后方民主运动逐渐深入，不少民主人士也由最初希望国民党在现有基础上改良，到最后接受中共提出的建立新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至更远。

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半个多世纪了，回顾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历程,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抗日战争的历

史,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郭沫若在 1946 年曾说“近几年来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大事件”。“假使在中国民主化走上轨道的一天,能有一部完整的《民主运动史》问世,那实在是值得双倍喜庆的事。”本书正是在中国民主化走上轨道的今天,为完成一部完整的《民主运动史》而作的努力。

第一章“满川风雨看潮生”
——运动的前奏

1937年7月的卢沟桥抗战，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也拉开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序幕。

中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不分前方后方，不分各行各业，捐弃前嫌，争取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基本的生存权力。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的强烈要求下，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同意和多年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对敌，并在政治上表现了若干的进步。全面抗战前因主张抗日被捕入狱的民主进步人士被释放，人民的抗日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在事实上得到承认，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的设立等等，使抗战初期的中国出现了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所有这些，在客观上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难得的公开合法的机会和条件。一直要求抗日、民主，希望以民主促进、推动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也充分利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有利的条件，高举抗日民主的大旗，把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推向前进，写下了全民族抗战历史上的重要一章。

中华民族要生存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勤劳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敢而且崇尚和平与自由。但是,在绵延了两千多年,已走向腐朽、没落、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在近代积贫积弱,屡遭外国列强的欺侮和侵略。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致使东北很快沦陷。4 个多月后,日军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又将战火烧到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全国同胞给予大力支援。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日本侵略者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扩大侵略热河，进而将魔掌伸向华北。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全国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民众坚决要求对日抗战，前线爱国官兵也坚决投入抗敌战斗。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怒吼。1935 年 12 月 9 日,他们满腔怒火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请愿、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北平救国运动发表告工友书、北平文化界许德珩等 149 人发表救国会宣言、上海马相伯等 280 名知识界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中国文化界的名流纷纷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海外华侨也深感振奋,向国内学生发电函表示全力支持。随着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空前强劲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在全国掀起。

1936 年 5 月 31 日，在各界各地救亡团体纷纷成立的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会这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更为高涨。救国会呼吁国民党停止消灭异己的内战,一致对外。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等。国民党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持压制态度。1934 年 11 月，对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亡枪口对内不

满的史量才被特务暗杀。1935 年 7 月,力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和国民党当局卖国行为的《新生周刊》主编及发行人杜重远被捕,判刑 14 个月。《新生周刊》也被封闭。同年 11 月,从事抗日宣传的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七君子又遭逮捕,全国震动。国民党诬陷七君子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难道人民爱国有罪,抗日有罪吗

就在国民党对国内爱国运动加以压制、迫害,在国际寻求所谓帮助的同时,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将中国东北沦为殖民地的日本侵略者,野心不断膨胀。为实现其独占中国的企图,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在 1937 年 7 月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被称为睡狮的中国警醒了,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行动起来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猖厥、横行。他们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为自己的尊严而战!这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的最根本原因。国民党政府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统治,对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断地进行限制、打击甚至镇压,并没有能制止得住以后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出现。

七七事变后,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市民以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投入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之战。他们不少人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帮助修筑防御工事,救护伤员,有的还直接拿起武器,英勇杀敌。北平市民发表拥护二十九军抗战宣言:(一)誓死反对日本武装侵略华北;(二)拥护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保卫平津;(三)立即驱逐日驻屯军出境;(四)反对签订一切屈辱条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等 20 多个团体组成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抗敌后援会还以成立大会的名义电慰二十九军及通电全国,一致奋起抗敌。

针对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宋庆龄、何香凝等早在 1932 年 12 月

就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进步人士，同国民党当局对民权的残酷摧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在筹备过程中，就积极开展营救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为宣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进步教授。他们打电报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强烈抗议对许的非法拘捕，要求迅即释放，并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经过他们的营救，许德珩等陆续获释。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何香凝等又在上海积极筹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全力支持各党派、团体、社会阶层、各族各界同胞和海外侨胞及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

1937 年 7 月 8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保卫北方，支援第 29 军抗战健儿，要求实施抗战国策，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此时还关押在苏州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 7 人也电勉前线将士，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并汇款百元，表示声援。文化界、学生界组织各种爱国团体，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同时呼吁政府和军队，力保国土，奋勇杀敌。民族资产阶级热情捐款支援前线。

在文化界救亡组织成立的同时，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相继组织工人救亡协会、抗战后援会。全国性的文化、学术、新闻、宗教及其他团体，昆明、长沙、安庆、西安、福州、贵阳、广州、成都、兰州等各地各界，纷纷推派代表到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抗日爱国将士，并募集巨款，支援前线。上海的工人还上前线帮助军队挖战壕、修工事。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刘湘等地方军队将领，也先后致电中央政府或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共赴国难，拥护抗战到底。全国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大声疾呼。正如同年 7 月 14 日平津各大学教授致国民政府林森等人的电文中所说：“国运已届否极之期，民气亦达沸腾之点”。在国难当头之际，

一切还有爱国心的人们，无不为全民族的抗日爱国热情所激励。

中共中央从新闻电讯中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即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同胞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痛心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1937 年 7 月 9 日，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毅然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

在抗日救亡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态度暧昧，既不退让又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甚至指示驻守平津的宋哲元部队："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并与日军谈判。蒋介石力图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范围。但侵略者岂肯善罢甘休？侵华日军气焰嚣张，他们调兵遣将，对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攻击。随着事态的扩大，国民党政府对日抵抗的态度日益强硬。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的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同时再次表示对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企求："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以求芦事的解决"。其时，日本侵略者早已抱定吞并中国的方针，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呼吁。

有感于政府对日的软弱态度，全国人民强烈地要求政府抗战。曾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政府无理镇压的爱国团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 7 月 10 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勇敢地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北平的和平而战！为人民的文明而战！"要求国民党实施抗战国策："迅速完成国防上最速和最低限度的准备，集中一切的人才，解放人民的枷锁，使我们的政治和社会都成为一个胜利的能发挥最大力量的机

构，以保障民族复兴大业的完成”。曾因从事抗日宣传而入狱的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即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著名报人邹韬奋在 10 多天的时间里筹备完成出版《抗战》三日刊，报道分析有关抗战的形势，反映民众的抗战要求。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致电正在前线抗日的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做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发挥贵军光荣历史，全国国民，愿为后盾。”职教社机关刊物也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敌人进无止境，除杀出重围，拼个你死我活之外，我们国族还有什么生路？”“真正的和平，是藏在炮火中。”① 黄炎培等人还多次列名于各界通电，责问政府为何不派兵增援上海抗战，坚决反对做城下之盟。通电表示：“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文约，我国民誓不承认。”通电还提出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要求政府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制定宪法，实行宪法。

全国新闻界也纷纷要求政府抗战。1937 年 7 月，上海《大公报》发表文章“，希望中央当局审时度势，领导全国”，奋起抗战。同时，上海的《申报》也指出：“我们必须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华北，给侵略者的野心以最大的打击。”上海《群众新闻》认为，政府当局应“对全国军队下书紧急动员令，使他们随时可以奉命到前线杀敌”。同时，应“积极组织群众，并且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使全国抗敌力量更加坚固地团结起来，并广泛地开展起来”。厦门《星光日报》也指出：“只有抗战，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动全面的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该报沉痛地呼喊：“起来，不愿做亡

①《国讯》第 170 期，1937 年 7 月 21 日。

国奴的人们!”① 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各阶层人士挽救民族危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人民既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表现很不满意，但又对国民党寄予厚望的心态。

为更好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各抗日党派、团体积极创办各种报刊。救国会成员在山西创办“全民通讯社”，在江西创办《前方日报》，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中国青年党创办《新中国日报》、《国论》杂志，其他如《战时教育》、《文艺阵地》等刊物，也大力宣传抗战。同时，各界人士还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援抗日战争。上海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社、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星一聚餐会”，研究抗日宣传和支援战争的各项工作。在全国各地，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决死队、青年战地宣传队、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救国会、妇女抗敌同志会、乡村巡回宣传队、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组织建立起来，开展从宣传、劝募、慰劳、动员到参军、参战各方面的抗战工作。抗战已成为全民族的首要任务。

受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一致要求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日本侵略军继 7 月 28 日、30 日占领北平、天津后，8 月 13 日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逼近国民党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和战不定的态度至此得到根本性的扭转。8 月 14 日，蒋介石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逼迫，兹不得已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的抗战，“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国民政府随即调动 73 个师参加保

①延安时事研究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翻印，第 150—15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